

毛泽东接见梁希、潘菽、金善宝等科学家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分别会见了许德珩、劳君展和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等九三学社先贤，鼓励他们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

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启发和关怀下，九三学社得以在“民主科学座谈会”基础上诞生，并作为一个民主党派，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自然科学座谈会”同志们最难忘的事

自1939年以来，在周恩来、潘梓年支持下，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谢立惠、李士豪等科技界人士近20人组成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其中一部分人参与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1943年，在梁希60岁生日到来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在新华日报社为梁希祝寿。周恩来在祝酒时说：“新中国总要到来的，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科学家。”梁希无限感慨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

当时，中共常在新华日报社邀请科技文教工作者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举行纪念会、联欢会、座谈会、时事报告会等活动，“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经常参加，成为新华日报社和中共领导人最信赖的朋友。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急需西北地区气象资料的时候，涂长望曾向延安提供了气象资料一大批气象书籍；延安急需农业技术和良种时，金善宝曾向延安提供了良种和技术资料。

1945年8月28日傍晚，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听到毛泽东飞抵重庆的消息。他们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毛泽东雄才伟略、胆识非凡，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大义凛然不辞深入虎穴，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担心的是蒋介石可能加害于毛泽东。

9月的一天，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谢立惠、李士豪等著名



李军绘画《自然科学座谈会》

教授接到毛泽东接见他们的通知，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兴奋、最难忘的事。

探讨国内时局问题

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谢立惠、李士豪等教授按通知所定的时间来到嘉陵江边张治中将军的公馆，王炳南在门口迎接。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寒暄落座后，像拉家常似的和大家交谈起来。先是说重庆气候恶劣，很不习惯。又说到飞抵重庆的经过和一路见闻，说重庆的科学家朋友提供的气象资料这次也派上了用场。毛泽东谈到延安现在的日子好过了，感谢国统区各界人士对延安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和帮助，还提到了重庆科学家支援良种和农业技术的贡献。

毛泽东询问大家对抗战胜利后国内时局的看法，梁希首先发言，他说：“我们感到很苦闷。”毛泽东等着梁希继续说，但梁希没有下文了。毛泽东频频点头，重复着梁希的话，“噢，苦闷——苦闷——苦闷”，连续三遍。接着大家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时局、国共两党和谈、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等方面感到困惑的问题，向毛泽东提问。毛泽东一一答复，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针对9月19日中共在重庆谈判中

提出“我军将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地区不包括在内）8个省区的根据地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集中”，潘菽问：“为什么把已经解放的一些地方让给国民党？”毛泽东站起来，在椅子旁边向后退了两步说：“退一步是可以的，退两步也可以。”然后做了个还击的手势说：“退三步就不可以了！”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的组织

座谈将结束时，毛泽东注意到坐得靠后的金善宝教授还没有发言，当时金善宝虽然只有49岁，但由于长期患胃病，加上工作劳累生活艰辛，已是满头白发。毛泽东亲切地问道：“后边那位白发先生有什么意见？”金善宝早早准备了一张名片，想送给毛泽东，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于是快步向前，把名片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名片，高兴地说：“噢，你就是金先生。金先生今年高寿喽？”“我今年50整。”金善宝临时说了个整数。“噢，想不到我还比你三岁哩！”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毛泽东请金善宝发表意见，金善宝考虑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有发动内战的迹象，担心毛泽东在重庆不安全，于是说：“今天我们都很高兴。从历史上看，人民总是要革命的，而革命又总是

要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又说：“毛先生是吃惯了小米的，到这里来吃大米是不习惯的。”他暗示毛泽东早作归计。大家非常担心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都希望他早日离开重庆。毛泽东很理解大家的心情，频频点头表示会意。会见结束时，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我十分感谢诸位教授先生们，在爱国、民主、和平方面，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对九三学社创始人的亲切接见，给了他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及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对九三学社的建立和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根据国际惯例，签字的次日即9月3日，是投降书正式生效的日子。9月3日，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

在举世庆祝的这一天，“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了扩大座谈会。鉴于战后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座谈会的同志感到斗争的道路很长，而战后都要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有必要建立永久性的组织以加强联系、团结奋斗，遂决定扩大成员，建立组织，并以九月三日这个日子命名，因为“抗战最久而受创最深之中国人民，对此伟大的民主胜利之九月三日，应谋发扬光大”，故称“九三座谈会”。

难忘的、发生在窑洞里的会见。其中《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还特别着墨于当时窑洞内的景象：“他那个窑洞内，除了一个大炕之外，还有一张木椅，一张桌子，一条木凳，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许多纸条，还有经济学和哲学书籍，桌上燃起油烛。”

未载于官方史料，仅当事人单方面记述的拜访就更多了，包括但不限于《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合众国际社记者厄尔·利夫、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代表田益民（《毛泽东会见记》封面照片拍摄者）、美国记者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夫人）、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

其中涂思宗特别提到了窑洞内的陈设：“我以视察团长身份，率随从往毛泽东官邸拜访。毛邸是连着窑洞的一幢草房，会客室亦是寝室，也是办公室，木床上铺着毛毡，帐内薄被五六张，毛穿灰衣布棉军服，与士兵穿的相同，惟领钮未扣，待人接物，礼貌颇周。”

后来，毛泽东移住到西边100余米处的吴家大院，据叶子龙回忆，“从洛川开会回来，毛泽东仍住在李家窑院那潮湿的窑洞里，他的风湿病更重了。我暗下决心为毛泽东寻找新的住处。”临走前，毛泽东给李建堂题写了“开明人家”的四字条幅以示谢意。过了两年，家中有高寿的长辈去世，毛泽东也不知从哪里听说，特意送来了亲书的一副挽联“西归瑶池德范尚存”。毛泽东的这些举动，让家里人打心底里敬重和感念。

（本文作者为北京市平谷区委机关工作人员、李建堂曾孙）

恽代英作联悼亡妻

周二中

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位有情有义的好丈夫。1918年2月25日，恽代英的妻子沈葆秀因难产去世，年仅22岁。恽代英心痛得快快要晕过去了，他大哭道：“是我误了妻子啊！”为悼念亡妻，恽代英随后作了这样一副挽联：

念汝端庄聪明，豪爽似男儿，婉柔似室女。好诗书，通情理，志道德，原谓将来，龟勉同心，用全力造福社会，造福家庭。岂意汝如许年华，竟因这一块肉，舍子而去。

自此丁零寂寞，承欢失贤助，治内失良妻。思往事，睹旧容，抚遗孀，只看目前，张皇万状，更无法处置丧礼，处置庶务。回忆此三载姻缘，难禁我万行泪，怆然

以悲。

挽联写出了妻子的贤惠，写出了夫妻二人对未来的规划，更道出了自己深沉的悼亡之情，联语情深意切，悲怆感人。恽代英将挽联悬于妻子灵前，以表达深深的哀思。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往事时说道：“大约就在这个时候（1917年），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作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恽代英当时是中国青年的领袖，郭沫若后来也深有感触地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受过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

徐伯昕创办生活书店

周星

1932年7月1日，徐伯昕与邹韬奋、胡愈之在上海创立了生活书店。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家“不是以谋求个人私利为目的，而是以提高人民大众的思想和文化水平为宗旨”的独特书店。它和后来的三联书店，都是帮助和推进中华民族进步和解放的一支“文化钢铁军队”。

生活书店起步资金只有2000元，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生活书店发展到全国有56个分店，创造了一个出版业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徐伯昕以十二万分的热忱，为生活书店的发展在默默奉献着，他曾因为肺病引发3次吐血，但仍不肯离开岗位。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他经常搬家，他还经常告诫子女们如有陌生人问起家庭情况，坚决不能说自己姓徐。

由于徐伯昕是生活书店的法人，所以他总是首先冲受到各种迫害。他曾两次到租界法庭，凭借自己机智的斗争艺术，维护

了书店的权益，粉碎了反动势力对进步文化的围剿。

抗战期间，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生活书店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的革命书籍，包括《全民抗战》等战时刊物和丛书近百种，成为当时书刊市场上战时读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徐伯昕还用预付稿费的方法接济那些坚持不与日伪合作的作家。1941年12月，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各地的生活书店，56个分店被全部查封，只留下了重庆书店，徐伯昕愤怒写下长文《生活书店横遭摧残经过》，以揭露当局摧残文化出版事业的真相。因为文章不能在重庆报纸上刊发，徐伯昕就和书店同仁到国民参政会现场分发，邮寄给读者，延安《新中华报》连续三天登载。这篇文章现被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

后来，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下，徐伯昕一直领导生活书店坚持下去，最终迎来了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联合，这就是著名的三联书店。

丰子恺初访梅兰芳

周惠斌

1947年春日的一个下午，丰子恺在摄影家郎静山的介绍和陪同下，来到上海马陆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拜访了素不相识的京剧表演家梅兰芳。

丰子恺对梅兰芳说：“五四时代，有许多人反对京剧，要打倒它，我读了他们的文章，似觉有理，从此也看不起京剧。不料留声机上的京剧音乐，渐渐牵惹人情，使我终于不买西洋音乐片子而专买京剧唱片，尤其是您的唱片了。原来，五四文人所反对的，是京剧的含有毒素的陈腐的内容，而我所爱好的是：京剧夸张的、象征的、明快的形式——音乐与扮演。”

梅兰芳听了，感到一种被理解、被欣赏的愉悦，微笑着问道：“丰先生何时见过我在舞台上的演出？”“战前，我曾去天蟾舞台看过一次，那时我不爱京戏，印象早已

模糊。后来爱看京戏了，您又暂别舞台了。”丰子恺说。抗战期间流亡重庆时，曾收到友人寄赠的一张梅兰芳蓄须照，因敬仰其爱国情操和高尚人格，因此特意将照片悬于屋内墙上，每日驻足凝视片刻。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听说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演出，他前往连看了5场，如痴如醉，由此萌生了拜访梅兰芳、一睹其人风采的念头。

丰子恺与梅兰芳虽是初次见面，但相谈甚欢。丰子恺建议梅兰芳多灌唱片，多拍有声有色的电影，把原汁原味的梅派艺术长久而广泛地保留并且流传下去。临别前，两人在“梅华诗屋”前的院子里拍了多张照片，丰子恺还赠送给梅兰芳一把扇子，画面是根据苏曼殊的诗句“满山红叶女郎推”而作，书法则是抄录了弘一法师在俗时所作的《金缕曲》，表达了对梅兰芳高尚人格和艺术天赋的敬意。

陈忠实与《白鹿原》

崔鹤同

1987年，陈忠实辞去陕西省作协的工作，对妻子说：“50岁之前，我一定要写一部能够带进棺材的书。”为了能够得到妻子的支持，陈忠实向妻子承诺：“如果我不能写出一部成功的小说，以后保证听你的话，我就去乡下养鸡赚钱贴补家用。”

当时，他的同乡、出生于1949年12月的路遥，1988年就创作了著名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并于1991年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52年出生的贾平凹，1986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浮躁》，1987年斩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铜奖。对此，陈忠实颇汗颜。

为了创作一部传世之作，陈忠实花了两年时间收集资料，又坚守

于乡间老屋，伏案笔耕。妻子隔段时间给他送来馒头、面条。他的祖屋附近，就是灞河长堤。他有时看到，有个男子挑着两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走出一个偌大的沙坑，把笼子里的石头倒在石头垛上，这样挑了几次，他把那沙石一锹一锹抛向箩筛，发出连续不断的声响，石头和沙子就在箩筛两边分流了。陈忠实突发联想，印成一格一格的稿纸如同那张箩筛。那个男子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粒一粒石子，而自己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个一个方块汉字。

陈忠实历时6年终于写成了长篇小说《白鹿原》，于1993年初版即引起轰动，并于1998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也成了他的“垫棺之作”，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光影史话

GUANGYINGSHIHUA

照片背景是我家

——一张著名历史照片背后的故事

李雨轩

在中国摄影史上，有一张著名的纪念秋收起义十周年合影。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倍感亲切，因为背景就是我大爷爷的家：李家窑院。

据叶子龙（时任中共中央机要科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初到延安时，住在凤凰山麓的李家窑院。这是一孔破旧的石窑洞，一盘土炕，一张破旧的桌子和一只木条凳是全部家当。窑洞门前，有一面土墙，全做抵御山风的影壁。我记得当时给毛泽东等参加1927年秋收暴动的人拍过一张照片，背景就是石窑洞前的土墙。”

通过不同时期照片的比对、不同人物回忆录之间的相互印证，我基本查证清楚了毛泽东在李家窑院居住的起止时间：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十三日，到达延安”。当晚“借住在二道街罗廷楨家院的东厢房里。因延安抗日救国会的办公处也设在院里，一天人来人往，声音嘈杂，也不利于保卫工作，便在一周后，移住到凤凰山下一位中医即李建堂的院子里”。

我的大爷爷就是照片中李家窑院的主人：中医即李建堂。



在李家窑院居住的时间里，毛泽东会见了许多中外人士，仅出自《毛泽东年谱》的权威记载就有3次：2月9日，“晚十时，在凤凰山住处会见范长江，作宽夜长谈。”3月1日，“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

些问题。”6月22日，“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了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

上述人士均有回忆文章发表，记述